

“悲喜交加”的概念、测量及相关研究述评^{*}

敖玲敏^{1,2} 吕厚超¹ 庞雪¹

(¹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重庆 400715) (²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重庆 401331)

摘要 “悲喜交加”是一种同时体验到高兴和悲伤的混合情绪体验,在个体面临有意义的事件即将结束,或即将失去曾经拥有的美好事物时所产生。“悲喜交加”产生的前提是混合情绪体验的存在,其强度可用“高兴”和“悲伤”情绪体验值中的最小值表示。根据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个体体验到该情绪的强度与老化正相关,并能引起注意的积极效应。悲喜交加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文化普遍性,同时也具有文化特殊性。未来研究应拓展悲喜交加情绪在文化特异性、性别差异等方面的研究,促进其在情绪管理和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应用。

关键词 悲喜交加; 混合情绪; 混合情绪体验;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

分类号 B842.6

1 引言

日常生活中,同时体验到高兴和忧伤的情绪普遍存在。例如,网络上流行的“年终欣喜恐惧综合症”,描述了个体在年终岁末时,既期待春节假期,又担心年终考评的一种复杂情绪状态;对于学生,假期既意味着可以好好放松,但也要面对期末考试。Larsen, McGraw 和 Cacioppo (2001)研究发现,在某些情境下,如观看电影《美丽人生》(Life is Beautiful)、乔迁新居、毕业生毕业当天,个体能够同时体验到高兴和忧伤的情绪。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简称 SST) (Carstensen, 2006)认为,随着年龄增长,个体感受到快乐和悲伤的混合情绪体验(a mixture of happiness and sadness)会增加,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个体知觉到未来生命中所剩时间越来越有限,在惋惜光阴有限的同时,也激发个体尽情享受当前有限而美好的时光。Carstensen (2006)以及 Ersner-Hershfield, Mikels, Sullivan 和 Carstensen (2008)进一步证实这种高兴和悲伤的

情绪能够同时发生,并称其为“悲喜交加”(poignancy)。

“悲喜交加”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但研究文献相对较少,研究方法也较为单一。直到最近,才有少量实证研究证据。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悲喜交加”情绪体验的概念界定、测量方法及相关研究进行述评,在理论上可以理清和丰富情绪体验的相关研究,如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等,使混合情绪体验研究更加深入,并能促进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的发展。在实践上,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悲喜交加”情绪的提出可以解释人类情绪的复杂性,有助于提高个体在面临离别、丧失和死亡时的适应能力。期望该文能为相关研究提供思路和启发,以便对“悲喜交加”情绪体验作进一步深入探讨,并提出新的研究方法或研究范式,丰富该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应用。

2 “悲喜交加”的概念界定

“悲喜交加”涉及到消极情绪中的“悲”和积极情绪中的“喜”成分,因此要理解悲喜交加情绪,首先要理解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含义。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指个体接受的内外刺激或事件满足其需要而产生的伴有愉悦感受的情绪,如高兴(happiness, happy) (郭小艳, 王振宏, 2007);消极情绪(negative emotion)通常表现为个体遭受挫折时所产生的低沉心理状态,如伤感、悲伤(sad,

收稿日期: 2012-07-09

^{*} 西南大学 2012 研究团队建设项目(TR201201-2)、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EIA100409)、西南大学 211 工程资助项目(NSKD11035)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9CZX043)资助。

通讯作者: 吕厚超, E-mail: houchao928@163.com

sadness)。混合情绪(mixed emotions)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情绪同时存在,有多种呈现方式,比如愤怒与高兴,厌恶与满意,尴尬与悲伤(Ersner-Hershfield et al., 2008),以及日常生活中做重大决策时所面临的复杂混合情绪体验(Podoynitsyna, van der Hans, & Song, 2011)。“悲喜交加”(poignancy)是一种同时体验到高兴和悲伤的混合情绪体验(mixed emotional experience),可以界定为当个体面临有意义的事件即将结束(meaningful endings),或即将失去曾经拥有的美好事物时所产生的情绪体验(Ersner-Hershfield et al., 2008; Ersner-Hershfield, Carvel, & Isaacowitz, 2009; Zhang, Ersner-Hershfield, & Fung, 2010; Kööts, Realo, & Allik, 2012)。对事件即将结束的预感是引起“悲喜交加”情绪体验的基本要素(Ersner-Hershfield et al., 2008)。但是,“悲喜交加”情绪体验不仅是由感知到的有限时间所引起,还包括个体面临一些具有重要情感意义事物的失去(Ersner-Hershfield et al., 2008)。当个体感知到自己即将失去曾经所拥有的事物,或一些有意义的事件即将结束时,便会产生“悲喜交加”情绪体验。

“悲喜交加”情绪产生的前提是混合情绪体验的存在,但是有关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能否同时出现曾存在较大争议(Russell & Barrett, 1999; Watson, Wiese, Vaidya, & Tellegen, 1999; Williams & Aaker, 2002)。以 Watson 等人(Watson et al., 1999)的积极激活-消极激活模型(positive activation – negative activation model, 简称 PA-NA)和 Russell 等人(Russell & Barrett, 1999; Russell & Carroll, 1999)的效价-唤醒模型(valence-arousal model)为代表的两级模型认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不能同时产生,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处在情绪模型的两端,互相排斥、彼此对立,如同“冷”和“热”一样,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既感到“冷”又感到“热”。因此,个体快乐时不会伤感,伤感时不会感到快乐;“快乐”(happy, happiness)是“伤感”(sad, sadness)的对立面(如图1)。

而 Cacioppo 和 Berntson (1994)提出的评估空间模型(evaluative space model, 简称 ESM)则认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能够同时产生,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是两个不同的变量,彼此独立,一个变量不受另一个变量的影响,单独经历从“无”到“有”再到“最强”的各种水平,就像“体重”和“身

高”是两个维度的不同变量一样(Larsen et al., 2001; Schimmack, 2005),认为这两种情绪能被个体同时或继时感受到(Cacioppo & Bernston, 1994; Cacioppo, Gardner, & Bernston, 1999)。如同个体可以同时感到“饥饿”和“寒冷”一样,个体也能同时体验“快乐(happiness)”和“伤感(sadness)”。至于到底同时感受到还是继时感受到,依赖于不同的具体情境。评估空间模型的观点与两极模型相对立(刘宏艳, 胡治国, 彭聃龄, 2008)。

总之,两极模型与 ESM 模型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承认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能够并存,即混合情绪是否存在。两极模型认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相互对立,不可能同时发生;ESM 模型则认为积极和消极情绪是两个独立的变量,但不相互对立,可以同时产生,从而肯定了混合情绪的存在。ESM 能够解释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情形,如人们常说的“百感交集”、“悲喜交集”、“啼笑皆非”等。相关脑成像研究(Davidson, 2004; Fredrickson, 2004; Hu, Liu, & Peng, 2005)也为此提供了证据。例如,Davidson (2004)的研究发现,不同的情绪加工对应着大脑中的不同脑区:中脑腹侧对边缘多巴胺通路的投射在积极情绪加工中具有重要作用;而杏仁核是消极情绪加工的核心区域(Hu et al., 2005)。左侧额叶更多地参与趋近相关的情绪行为,而右侧额叶则更多地参与回避相关的情绪行为(Davidson, 2004)。这些脑成像研究表明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神经网络是部分分离的,因而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可以共同激活。

3 “悲喜交加”的测量

Kaplan (1972)提出了一个可以评估混合情绪强度的测量标准: $ME = PA + NA - |PA - NA|$ (Wildschut, Sedikides, Arndt, & Routledge, 2006)。其中 ME 代表混合情绪, PA 代表积极情绪的平均值, NA 代表消极情绪的平均值。从公式中可知,上述测量标准可以简化为 PA 和 NA 中最小值的 2 倍(Priester & Petty, 1996),从而很容易将混合情绪的概念概括化为 PA 和 NA 中的最小值(Ersner-Hershfield et al., 2008),此最小值标准在后来的研究中广为采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Schimmack, 2001; Larsen, McGraw, Mellers, & Cacioppo, 2004)。更重要的是,当使用上述最小值标准时,若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值都相对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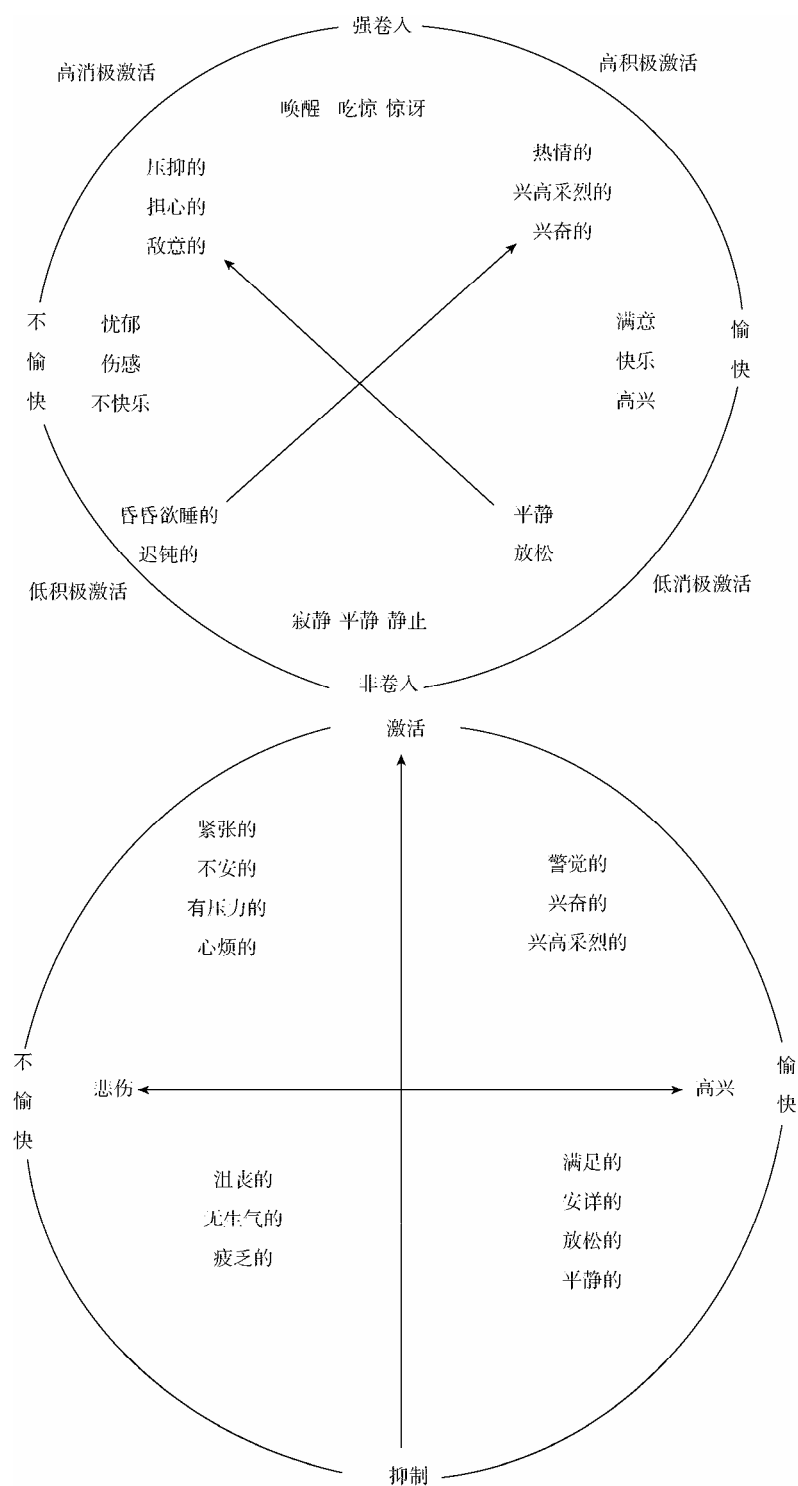


图 1 Watson 和 Tellegen 的 PA-NA 模型与 Russell 的效价-激活模型

(资料来源:Larsen & McGraw (2011). Further evidence for mixed emo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0(6), 1095-1110.)

则混合情绪值也较高;若积极情绪值和消极情绪值中有一个较低,或两个都较低时,则混合情绪值也较低。这符合混合情绪的概念内涵,表明上述最小值标准是混合情绪体验的合适的测量标准。

现有的“悲喜交加”混合情绪研究中,一些研究者(Ersner-Hershfield et al., 2008; Zhang & Fung, 2009; Zhang et al., 2010)认为“悲喜交加”情绪中涉及到的关键情绪是“悲(Sadness)”和“喜(Happiness)”。为了表述简便,采用公式 $Poignancy = \text{Minimum} [Happiness, Sadness]$, 也就是“悲喜交加”混合情绪体验可以用“高兴”和“伤感”两体验值中的最小值表示。例如,情绪评定量表是7级评定(从“根本不”到“非常”),如果个体在高兴上的得分为2,在伤感上的得分为5,那么个体悲喜交加的混合情绪体验值就是2。因此,悲喜交加的情绪体验值处于“1”到“7”分之间,“1”代表无悲喜交加情绪,“7”代表悲喜交加的情绪体验水平最高。

最新研究(Sutin & Stockdale, 2011)对该公式进行了灵活应用,采用公式: $Mixed\ Emotions = \text{Minimum} [Positive\ Affect, Negative\ Affect]$ 计算被试的混合情绪,得出有价值的结果。这表明,用积极情绪中的“高兴”和消极情绪中的“伤感”两体验值中的最小值作为“悲喜交加”情绪体验的表示方法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4 “悲喜交加”的相关研究

目前有关悲喜交加的研究相对较少,大多是在西方文化下进行的。所涉及的研究内容相对狭窄,主要基于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探讨该情绪体验与老化的关系,研究方法也相对单一。尽管如此,现有研究仍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4.1 “悲喜交加”与老化

“悲喜交加”现象是在 SST 的相关研究中(Carstensen, 2006; Carstensen, Isaacowitz, & Charles, 1999)发现的。SST 是动机的生命全程理论,认为对未来生命中所剩时间的感知是个体动机的组成部分,影响着社会目标的优先性选择。当知觉到未来时间非常有限时,优先选择以情绪调节为目标;反之,则偏向选择以获取知识为目标(Carstensen, 2006; 敖玲敏, 吕厚超, 黄希庭, 2011)。情绪体验的能力随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Carstensen et al., 2011)。当个体感到所剩时间有

限,如变老和面临死亡,他们更可能关注情绪意义目标,关注短期或即时的情感满足。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或知觉到的未来时间越来越有限,个体体验到复杂或悲喜交加的混合情绪的可能性就更大(Zhang et al., 2010)。随着死亡的临近,个体既感恩生命的历程又意识到珍贵的时光已流逝。

Lazarus (1991)的评估理论表明这种丧失感与悲伤情绪有关。然而,由于个体同时体验到生命历程中积极的进步,因而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快乐感。相关研究通过检验(Carstensen, Pasupathi, Mayr, & Nesselrode, 2000)情绪体验的年龄差异进一步验证了这一假设,在抽样调查中比较了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正相关,发现老年被试比年轻被试的相关更高。此外,有证据发现老年人体验到更多的复合情绪(complex emotional) (Ersner-Hershfield et al., 2008)。例如,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同时发生的频率更多(Carstensen et al., 2000)。Carstensen 及其同事(2000)认为这是因为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多地知觉到未来时间的有限,“最后时光”(last times)的体验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Carstensen, Fung, & Charles, 2003; Carstensen, 2006; Flaherty, 2012)。最近研究(Ersner-Hershfield et al., 2008; Zhang et al., 2010)直接检验了有意义的结束(meaningful endings)与“悲喜交加”情绪体验之间的关系,发现在实验室和自然情境下,不管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当知觉到未来时间有限时都体验到较高水平的“悲喜交加”情绪。然而,未来时间洞察力与“悲喜交加”情绪体验的因果关系还需进一步验证。

4.2 “悲喜交加”与注意的积极效应

时间洞察力不仅影响未来目标的选择,也影响个体的注意。具体来说, SST 认为开放的时间知觉使个体倾向于关注知识相关的信息,而有限的时间知觉使个体更加注意情绪意义信息。由于悲喜交加情绪产生于有限的时间体验, SST 认为,个体在体验到混合情绪的同时,也会因事件的结束在即而更加关注其积极效应,使积极效应最大化而消极效应最小化。如上所述,由于老年人更易体验到悲喜交加情绪,一系列研究通过比较老年人与年轻人的情绪性注意偏向间接证实了悲喜交加情绪的注意效应: Mather 和 Carstensen (2003)通过点探测实验(dot-probe experiment),考察老年人与年轻人对情绪图片的注意偏向,结果发现当

点出现在积极或消极图片上时,年轻被试的反应时间相当,而老年被试在积极图片上反应更快。此外, Mather 等人(2004)通过 fMRI 实验发现,老年人在观看积极图像时其杏仁核(与情绪加工有关的脑区域)的激活程度显著高于观看消极图像时,表现出对消极信息编码的减退,而年轻人在两种条件下具有等同的激活程度。为直接检验悲喜交加情绪与注意模式的关系, Ersner-Hershfield 等(2009)在实验室条件下通过想象最后一次参观有个人意义的场所,启动个体的悲喜交加混合情绪,并使用眼动技术记录个体在观看积极和消极图片时的注视点,结果发现相比于未启动悲喜交加情绪的控制组,实验组被试更倾向于关注积极图片,表明了悲喜交加情绪会引起注意的积极效应。

理论上,悲喜交加情绪中注意的积极效应起到情绪调节的作用。具体来说,若有限的时间体验会引起悲喜情绪的混合,为缓解悲伤情绪,个体可能会更关注环境中的积极信息。另一方面,体验到快乐会使个体倾向于寻找积极信息来调节当前的悲伤情绪。然而,情绪性注意偏向是否会引起相应的情绪体验有待进一步明确,因此未来研究需考察悲喜交加情绪、注意的信息加工以及其后的情绪体验间的关系。此外,上述情绪调节模式并不适用于年轻个体,他们倾向于关注与心境协调的环境信息,如 Isaacowitz, Toner, Goren 和 Wilson (2008)发现,当处于积极情绪时,年轻被试更多关注积极面孔图片,而处于消极情绪时,他们更关注消极情绪图片。因此未来研究需进一步考察不同年龄群体在悲喜交加混合情绪中的注意偏向是否存在差异。

4.3 “悲喜交加”的文化普遍性与特殊性

“悲喜交加”的研究几乎都是在西方文化下进行的。Larsen 等(2001)研究发现,大一新生每天早上离开宿舍时,既为“新的一天开始”而感到高兴,同时也为“又要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之中”而感到焦虑;毕业生在毕业当天,毕业典礼上,既为自己取得学位而感到高兴和欣慰,同时又因为自己即将告别母校、与同学分别而感到伤感(Larsen et al., 2001; 刘宏艳等, 2008)。Pilar 和 Luis (2007)在研究中要求大学生被试回忆取得录取通知书时的情绪体验,大多数被试报告当时很高兴、很激动,因为梦想实现了,并对新的生活充满期待;但同时

也报告了沮丧情绪,因为他们不愿与老朋友离别(Pilar & Luis, 2007)。

有研究(Zhang et al., 2010)采用中国(香港)被试重复 Ersner-Hershfield 等人(2008)的研究,发现中国被试也存在“悲喜交加”情绪,但是与先前研究(Carstensen et al., 2000; Charles, 2005)有所不同。先前研究发现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可能体验到悲喜交加的情绪状态;然而在 Zhang 等人(2010)的研究中并未发现这种趋势。表明“悲喜交加”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文化普遍性,同时也具有文化特殊性。

研究表明,特定情绪的核心受文化群体中自主性、群体性或神性的道德核心影响(Rozin, Lowery, Imada, & Haidt, 1999)。众所周知,东方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加强调辩证思维,例如朋友亦敌人。这使得东方文化背景下更可能体验到混合情绪或辩证情绪(dialectical emotions) (Miyamoto, Uchida, & Ellsworth, 2010)。比如,日本是一个忧患意识比较强的民族,这种忧患意识使日本人即使在高兴的情景条件下也保持低调、警惕。再比如,中国人在情绪表达方面比较含蓄,即使非常高兴的情绪体验,在表达时也会有所保留或者适当压抑自己的情绪。另外,在东方文化里,社交中展现更多的社交方面的情绪(socially engaging emotions),如尊重和内疚(Zhang et al., 2010; Kitayama, Karasawa, & Mesquita, 2004),而非社交情绪(socially disengaged emotions),如高兴和悲伤展现出来的就比较少。因此,中国被试可能仅在社交情绪(socially engaged emotions)体验中才显示出较明显的“悲喜交加”现象。因此对于“悲喜交加”的研究在关注其普遍性的同时也要重视不同文化背景的特殊性。

5 未来研究展望

第一,悲喜交加的性别差异问题。个体体验到悲喜交加情绪的强度与老化、未来时间感知密切相关。根据 SST (Carstensen, 2006),当人们意识到未来生命所剩时间有限时,倾向于体验到更多的悲喜交加情绪,而未来时间洞察力比生理年龄更能准确预测人们社会目标的选择,也影响个体的悲喜交加情绪体验(Ersner-Hershfield et al., 2008; Flaherty, 2012)。研究者常常将“年龄”作为研究变量,采用年轻人与老年人作对比实验,但是

作为人口学变量的另一个因素——“性别”也很重要,特别是在心理学相关领域研究中。如最近一项研究中(敖玲敏, 2012),研究者分别在实验室情景和真实生活情景下进行实验,结果发现悲喜交加情绪体验存在性别差异,表现为女性被试的情绪体验高于男性,但该结果有待进一步证实。

第二,悲喜交加的研究方法问题。现有研究几乎基于两种情景的实验设计:想象有意义的结束情景(如,想象在具有个体意义的地方度过余下时光)和真实情景(如,大学毕业生毕业离校当天)(Ersner-Hershfield et al., 2008; Zhang et al., 2010)或观看电影《美丽人生》(Larsen et al., 2001)。让被试报告当时的情绪体验,要求被试进行情绪评定(自我情绪评定表包括8个积极情绪词汇和11个消极情绪词汇)。然后根据公式: $ME = MIX [Happiness, Sadness]$ 得出“悲喜交加”情绪体验值。但是,该公式只分析实验中被试的高兴和悲伤情绪,而被试对其他情绪词汇的评定只作为参考,这可能会导致一些有用信息的丢失。未来研究在探索新研究方法的同时,可以考虑对被试的其他情绪词汇的评定值进行分析,以获得更多有用的研究信息。

第三,悲喜交加的跨文化研究问题。作为情绪体验方式的一种,混合情绪体验的跨文化一致性尚待进一步研究。现有研究表明,悲喜交加的混合情绪体验几乎存在于所有被试中。但是,这些研究的被试大多是功能正常的大学生或成年人(Larsen & McGraw, 2011; Ersner-Hershfield et al., 2008; Zhang & Fung, 2009; Zhang et al., 2010),并且主要来自西方文化(主要来自美国)。因此,研究结论可能不足以代表东方文化。例如,作为典型东方文化代表的中国和日本,具有浓厚的辩证思维,使得在东方文化背景下更可能体验到混合情绪或辩证情绪。众所周知,情绪与认知的关系密切,那么情绪的文化差异是否由认知过程引起?研究表明,具有沉思忧郁文化特点的俄罗斯人比美国人更关注负性情绪,而对于俄罗斯与拉脱维亚(更多受西方文化影响)融合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当用典型文化图片启动俄罗斯文化时,个体倾向于关注负性情绪,相反,当启动拉脱维亚文化时,个体倾向于关注正性情绪,表明情绪的文化差异可由与信息加工有关的注意偏向引发(Grossmann, Ellsworth, & Hong, 2012)。因此,进行悲喜交加混

合情绪的跨文化研究十分必要。

第四,悲喜交加的情绪体验是个体在相应情景下的正常情绪反应。例如,当毕业生面临毕业,即将离开母校、与好友各奔东西时,既对未来充满憧憬,又对眼前的离别依依不舍,这些感受是大多数毕业生会经历的。有研究(Ersner-Hershfield, Scheibe, Sims, & Carstensen, 2013)发现混合情绪有利于个体的身体健康。而身体健康往往与心理健康关系密切,那么个体体验到混合情绪的高低或频率与个体自我情绪调节能力、情绪心理状态、个体身心健康水平的关系如何?能否把这种混合情绪体验作为情绪管理和心理健康教育的指标?这些疑问也是未来研究值得考虑的问题。

参考文献

- 敖玲敏. (2012). 悲喜交加情绪体验的性别差异: 基于实验室情景与真实生活情景的研究证据. 硕士学位论文, 西南大学.
- 敖玲敏, 吕厚超, 黄希庭. (2011).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概述. *心理科学进展*, 19(2), 217-223.
- 郭小艳, 王振宏. (2007). 积极情绪的概念、功能与意义. *心理科学进展*, 15(5), 810-815.
- 刘宏艳, 胡治国, 彭聘龄. (2008). 积极与消极情绪关系的理论及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16(2), 295-301.
- Cacioppo, J. T., & Berntson, G. G. (1994).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itudes and evaluative space: A critical review, with emphasis on the separability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substrat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5, 401-423.
- Carstensen, L. L. (2006). The influence of a sense of time on human development. *Science*, 312, 1913-1915.
- Carstensen, L. L., Fung, H. L., & Charles, S. T. (2003).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and emotion regulation in the second half of life. *Motivation and Emotion*, 27, 103-123.
- Cacioppo, J. T., Gardner, W. L., & Berntson, G. G. (1999). The affect system has parallel and integrative processing components: Form follows fun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6, 839-855.
- Carstensen, L. L., Isaacowitz, D. M., & Charles, S. T. (1999). Taking time seriously: A theory of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4, 165-181.
- Carstensen, L. L., Pasupathi, M., Mayr, U., & Nesselroade, J. R. (2000). Emotional experience in everyday life across the adult life sp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9, 644-655.
- Carstensen, L. L., Turan, B., Ram, N., Scheibe, S., Ersner-Hershfield, H., Samanez-Larkin, G. R., ... Nesselroade, J. R. (2011). Emotional experience improves

- with age: Evidence based on over 10 years of experience sampling. *Psychology and Aging*, 26, 21–33.
- Charles, S. T. (2005). Viewing injustice: Greater emotion heterogeneity with age. *Psychology and Aging*, 20, 159–164.
- Davidson, R. J. (2004). Well-being and affective style: Neural substrates and biobehavioural correlate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359, 1395–1411.
- Ersner-Hershfield, H., Carvel, D. S., & Isaacowitz, D. M. (2009). Feeling happy and sad, but only seeing the positive: Poignancy and the positivity effect in attention. *Motive Emotion*, 33, 333–342.
- Ersner-Hershfield, H., Mikels, J. A., Sullivan, S. J., & Carstensen, L. L. (2008). Poignancy: Mixed emotional experience in the face of meaningful ending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4, 158–167.
- Ersner-Hershfield, H., Scheibe, S., Sims, T. L., & Carstensen, L. L. (2013). When feeling bad can be good: mixed emotions benefit physical health across adulthood.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4(1), 54–61.
- Flaherty, M. G. (2012). Time and the horizon of poignancy: Notes on temporally induced sorrow. *KronoScope*, 12(1), 90–103.
- Fredrickson, B. L. (2004). 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359, 1367–1377.
- Grossmann, I., Ellsworth, P. C., & Hong, Y. Y. (2012). Culture, attention, and emo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1(1), 31–36.
- Hu, Z. G., Liu, H. Y., & Peng, D. L. (2005). Several hot-debated issues of amygdala research in emotion. *Neuroscience Bulletin*, 21(4), 301–307.
- Isaacowitz, D. M., Toner, K., Goren, D., & Wilson, H. R. (2008). Looking while unhappy: Mood-congruent gaze in young adults, positive gaze in older adult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9), 848–853.
- Kaplan, K. J. (1972). On the ambivalence-indifference problem in attitud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A suggested modification of the semantic differential techniqu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77, 361–372.
- Kitayama, S., Karasawa, M., & Mesquita, B. (2004). Collective and personal processes in regulating emotions: Emotion and self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P. Philippot & R. S. Feldman (Eds.), *The regulation of emotion* (pp. 251–273). Mahwah, NJ: Erlbaum.
- Kööt, L., Realo, A., & Allik, J. (2012).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guistic antonyms in momentary and retrospective ratings of happiness and sadness. *Journal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3(1), 43–53.
- Larsen, J. T., & McGraw, A. P. (2011). Further evidence for mixed emo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0(6), 1095–1110.
- Larsen, J. T., McGraw, A. P., & Cacioppo, J. T. (2001). Can people feel happy and sad at the same tim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1(4), 684–696.
- Larsen, J. T., McGraw, A. P., Mellers, B. A., & Cacioppo, J. T. (2004). The agony of victory and thrill of defeat: Mixed emotional reactions to disappointing wins and relieving loss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5(5), 325–330.
- Lazarus, R. S. (1991). *Emotion and adaptation*.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 Mather, M., Canli, T., English, T., Whitfield, S., Wais, P., Ochsner, K., Gabrieli, J., & Carstensen, L. L. (2004). Amygdala responses to emotionally valenced stimuli in older and younger adult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5, 259–263.
- Mather, M., & Carstensen, L. L. (2003). Aging and attentional biases for emotional fac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4, 409–415.
- Miyamoto, Y., Uchida, Y., & Ellsworth, P. C. (2010). Culture and mixed emotions: Co-occurrenc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Emotion*, 10(3), 404–415.
- Pilar, C., & Luis, O. (2007). Drawing mixed emotions: Sequential or simultaneous experiences? *Cognition and Emotion*, 21(2), 422–441.
- Podoyntsyna, K., van der Hans, H., & Song, M. (2012). The role of mixed emotions in the risk perception of novice and serial entrepreneurs. *Theory and Practice*, 36, 115–140.
- Priester, J. R., & Petty, R. E. (1996). The gradual threshold model of ambivalence: Relating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bases of attitudes to subjective ambival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 431–449.
- Rozin, P., Lowery, L., Imada, S., & Haidt, J. (1999). The CAD triad hypothesis: A mapping between three moral emotions (contempt, anger, disgust) and three moral codes (community, autonomy, divin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6, 574–586.
- Russell, J. A., & Barrett, L. F. (1999). Core affect, prototypical emotional episodes, and other things called emotion: Dissecting the elepha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6, 805–819.
- Russell, J. A., & Carroll, J. M. (1999). On the bipolarity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5(1), 3–30.
- Schimmack, U. (2001). Pleasure, displeasure, and mixed feelings: Are semantic opposites mutually exclusive? *Cognition and Emotion*, 15, 81–97.

- Schimmack, U. (2005). Response latencies of pleasure and displeasure ratings: Further evidence for mixed feelings. *Cognition and Emotion*, 19(5), 671–691.
- Sutin, A. R., & Stockdale, G. D. (2011). Trait dissociation and the subjective affective, motivational, and phenomenological experience of self-defining memor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0, 939–964.
- Watson, D., Wiese, D., Vaidya, J., & Tellegen, A. (1999). The two general activation systems of affect: Structural findings, evolutionary considerations, and psychobiological evid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6, 820–838.
- Wildschut, T., Sedikides, C., Arndt, J., & Routledge, C. (2006). Nostalgia: Content, triggers, func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1, 975–993.
- Williams, P., & Aaker, J. L. (2002). Can mixed emotions peacefully coexist?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8, 636–649.
- Zhang, X., Ersner-Hershfield, H., & Fung, H. H. (2010). Age differences in poignancy: Cognitive reappraisal as a moderator. *Psychology and Aging*, 25(2), 310–320.
- Zhang, X., & Fung, H. H. (2009). Does graduation give rise to increased poignancy? Moderation roles of university identity and emotion regulat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7, 722–727.

Poignancy: Conception, Measurement and Related Studies Review

AO Lingmin^{1,2}; LV Houchao¹; PANG Xue¹

(¹ School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² Chongqing City Management College,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Poignancy is defined as a mixed emotional experience that arises when one is faced with meaningful endings, which means people can feel happy and sad at the same time or co-occurrenc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The concept of poignancy is based on the existence of mixed emotions. However, unlike other instances of mixed emotions, poignancy seems to be particular to the experience of meaningful endings, of no longer having something that one once had. Previous researches have operationalized the poignancy as the minimum between the happiness of positive emotion and the sadness of negative emotion.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maintains, when people are aware of the finitude of time or aging, they are increasingly feeling more poignancy which will cause the positivity effect in attention. Prior studies reported that the experience of poignancy is generalizable across cultures and cultural specificity sometimes. In further studies,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advancement of the gender differences and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on poignancy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n the emotion management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Key words: poignancy; mixed emotions; mixed-emotion experience;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